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先秦印风

重庆出版社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先秦印风

总主编 黄 惇
本卷主编 徐 畅

重庆出版社

总策划： 李书敏
周永健

总主编： 黄 惇
本卷主编： 徐 畅

责任编辑： 周永健
裴小蕙

印章释文校阅： 张一农
吴茂礼

技术设计： 郑汉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先秦印风

XIANQIN YINFENG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5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66-4114-1/J·524

定价：50.00 元

凡 例

一、《历代印风系列》，(以下称《系列》)计 21 卷，分卷为三个类别：①先秦至清初用断代的方式划卷，该类计有《先秦印风》、《秦代印风》、《汉晋南北朝印风》(上)、(中)、(下)、《隋唐宋印风(附辽夏金)》、《元代印风》、《明代印风》、《清初印风》等 9 卷。②清代至近当代以印章流派分卷，该类计有《清代徽宗印风》(上)、(下)、《清代浙派印风》(上)、(下)、《赵之谦印风(附胡钁)》、《吴昌硕流派印风》、《黄牧甫流派印风》、《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齐白石、丁二仲、经亨颐、简经纶、来楚生印风》等 9 卷。③以印章的特殊类别分卷，该类计有《历代印匋封泥印风》、《历代图形印吉语印印风》、《明清瓷器押印印风》等 3 卷。

二、《系列》撰有总序，以明白书之编撰宗旨；有专论，以研究各卷所涉印章的学术、艺术问题；其中部分卷有年表，以提供各卷所收印章、印人、印事的研究素材；有印人传，以提供流派印人的生平、时代背景材料、著述等资料，以便读者对印人有更多的了解。其中部分卷未设年表、印人传，或有年表不设印人传，其原因为两种：①有的卷因所收印章的年代久远(如先秦、秦代、汉魏、南北朝等)印学资料严重不足，故省略年表；因流派印尚未产生，故不设印人传。②少数分卷已将印人传的内容并入专论中，故亦省略印人传。

三、《系列》各卷尽可能按时序排列先后，不能确切考辨其刻制时间者，则据其风格特点归类排列。

四、《系列》各卷印章的释文，尽可能考识为今用简化字，目前尚不能考识的印文以“□”形符号注明，目前我们尚无法识读的印章(如辽、夏、金、元等部分印章)则标明“待考”，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五、《系列》各卷所收印章，为照顾版面的美观，均未编号，故释文按版面印章的分布分行排列，以便读者按行对应释读印章。

中国历代印风总序

黄 惇

印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存的实物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社会交往的凭信,已经使用了印章。此外在制陶工艺中,古代的劳动者所使用的陶拍与戳子,在使用上与印章之手段相合,抑或它原本就是产生印章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凭信的印章与作为劳动工具的戳子,在长期发展中合流,成为印章绵延数千年存在的基础。在实用印章阶段,秦汉时期堪称鼎盛。六朝以降,印章开始与书画艺术结缘,书画上的鉴藏印成为印章向纯艺术过渡的契机。由于文人将印章不断引进书画,并注入更多的艺术因素,至元代始演化为一门自觉的文人艺术。在元代不仅确立了印宗秦汉的审美观念,且出现了集自写自刻于一身的文人篆刻家。此后经明清文人的努力,在印材、技法、创作思想、艺术理论诸多方面逐渐使篆刻艺术得以丰富和完善,至此印人辈出,流派变换,风格绚烂,蔚然成风。这样明清两代作为文人篆刻艺术的高峰期,与秦汉时期的实用印章被称为印章史上的“双峰”。在文人篆刻艺术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民间手工业中的印章也以自己的传统向前发展,尽管他是非自觉的,但依然孕藏着艺术的创造,宋元时期的押印和明清陶瓷上的押印集中体现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自唐代以来,便出现了记录印章的印谱。印谱从最初的原始形貌至今,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各时期的各种印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其一是集古印谱,即将历代留传与出土的古代印章汇集于一谱,它兼有考古和鉴赏的双重功能。其二是摹古印谱,它是晚明以后,印人为学习古代印章自己动手以各种印材摹刻后钤拓成的印谱,其目的用以展示印人在临古上的传统功力。其三是创作印谱,即文人篆刻家将自己创作的印作并侧款钤拓汇集成谱,它是篆刻家艺术作品的集中体现。将一个时期诸位篆刻家的印拓或将同一流派的篆刻家印拓辑于一谱,实际上是若干创作印谱的合成。因此印谱之类别舍以上三种则无其他。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收集,囊括了从商代至近世的历代印章,从印谱的分类上则可以说是诸类印谱的综合。我们知道由于印章本身所具的内涵,编辑印谱的动机并非出于相

同的立场。例如 60 年代罗福颐先生集辑《古玺汇编》就主要出自考古学的立场。与之不同,《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虽然必须借鉴和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对印章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着眼于“印风”——即印章的艺术风格,因此它的视角主要是从艺术学的立场出发的。

在元代之前的实用玺印分类中,我们注意到了两条必不可少的线索。一是时代顺序之线索,二是艺术形式之线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造成诸种实用印章所具有的艺术形式的因素,如印章用途、印章形制、印章制度;入印的文字差异、地域的差异;印材的差异及不同的刻制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决定着印章艺术形式的不同,决定着印章艺术风格的变异。并且因这两条主线索与诸多决定形式美的因素交叉影响,形成了实用印章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为此,如何以艺术形式来确定艺术风格的分类成为我们工作的重要课题。

同样,欲清理元、明、清以来流派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类型,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首要的事情是确定代表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因此必须拂去时代尘埃的覆盖,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关于印人的流派归属与界定、印风的形成与变化,都需要史料和印作图版的支撑,尤其对于那些流派篆刻艺术史上模糊不清的问题更是如此。鉴于《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特殊视角和分类方法,我们希望在其编辑过程中对现存的许多问题有所清理并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以使人们对各时期印人、流派的印风有一明晰的认识。出于对历史上印章文化的全面观照,《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还十分注意民间用印的收集和整理,诸如历代印玺、元代押印、以及明清青花瓷器押印等等。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印章发展中的另外一侧。

概言之,《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是以艺术风格的分类展现于读者面前的。因此我们期望其不仅对研究篆刻艺术的专家来说是一套有价值的史料图谱,也期望其成为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们有价值的艺术资料和学习范本。从中既可看到各时代、各流派不同印风的代表作品,了解印风的形成与盛衰,也可以看到流派的承递与篆刻家的成长之路。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书目

先秦印风
秦代印风
汉晋南北朝印风(上)
汉晋南北朝印风(中)
汉晋南北朝印风(下)
隋唐宋印风(附辽夏金)
元代印风
明代印风
清初印风
清代徽宗印风(上)
清代徽宗印风(下)
清代浙派印风(上)
清代浙派印风(下)
赵之谦印风(附胡钁)
吴昌硕流派印风
黄牧甫流派印风
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
齐白石、丁二仲、经亨颐、简经纶、来楚生印风
历代印玺封泥印风
历代图形印吉语印印风
明清瓷器押印印风

目 录

凡例	1
中国历代印风总序	1
先秦玺印艺术风格述略	1
图版	
殷商钁印	17
西周钁印	19
春秋钁印	20
战国楚系官钁	26
战国齐系官钁	41
战国燕系官钁	57
战国晋系官钁	71
战国秦系官钁	91
未明时地官钁	94
战国姓名私钁	97
战国成语钁	197

先秦玺印艺术风格述略

徐 畅

印章艺术的风格,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各种要素之中。先秦古玺因其时代、地域(国别)的不同,而产生丰富多变的文字形体、体势和复杂各异的形制,并因此而发展出章法的千变万化,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格。

一、先秦古玺的时代特征

黄濬《郟中片羽》(初/中集·1935年/1937年)、于省吾《双剑谿古器物图录》(1940年)先后著录的三方安阳出土的商代玺印,曾经引起一些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的重视。我曾在十多年前做过专门研究,撰写有《商玺考证》一文^①,对三方玺印的文字进行考释、断代,并以文献的记载为理论支持,证明商玺的存在。其中亚形边框的“亚禽氏”玺(见图一)与以日为名的“瞿甲”玺(印见本卷图版17页)都有很多铜器氏族徽号(族徽)相佐证,并都具有商代的文化特点。“子亘□□”玺(见图二)的“亘”在甲骨卜辞中为贞卜人名、方国首领。三玺印文多有图形描绘之形体,且字数不多,仅一二字而已。禽氏及瞿甲族徽(或谓徽号)文字是氏族的标志,也是氏族首领的私名,更是商代文字的标志。印文、平板的印体和介于鼻钮、桥钮之间的印钮,十分古朴,已开周秦鼻钮之先河,实为后世佩印之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三代秦汉六朝古陶》收录的一字阳文陶器印迹(见图三),字口清晰,显然系用阴文玺印钤压而成,殷代金文中有与之写法近似的例证^②,应为族徽文字。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使用玺印钤盖于陶器之上了。

商代“对铜器的重视点,在纹不在铭。”^③所以商周时期的彝器所具备的造形奇特、纹饰繁缛、光彩夺目的艺术特点也反映到玺印中来。本卷所录之《尊古斋集印》的饕餮纹图像玺、凤鸟纹图像玺正与商代铜器纹饰的特征相似。黄宾虹在三十年代就曾说过:“古者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④

商周时期已有图像玺印的制作与使用。《尊古斋集印》、《宾虹藏古铤印》收录之夔龙纹



图 一

玺印、凤鸟纹玺印、窃曲纹玺印与同时代纹饰的流风相同,已为印学界公认。

近年出土可考的西周长阳陶玺及扶风铜玺各两枚。长阳陶玺为泥质,椭圆柱形或圆柱形钮(见图四、五),印面为刻划符号或图像,“时代下限为西周。”根据近年汉墓出有多枚先秦玺印的实例^⑤,从两玺的形制及印文判断,有可能早于西周。扶风二玺中一枚为铜质双联玺印,上为三角形印,内含三角形、嵌形图案;下为扁方形图像印,内饰弓形云纹,两印由一绞索状桥形钮联接,形制特异(见图六)。另一枚为凤鸟纹图像玺印(见图七),有西周铜器纹饰的特征,同时也证明前述传世图像玺印的真实可信。

西周也有文字玺印的使用。陶器阴文印迹见于《三代秦汉六朝古陶》收录的“令作韶塤”(见图八)、“令司乐作太室塤”(见图九)、“满作韶塤”(见图十),三印迹的文字与西周金文形同,西周文字的风格特点非常明显。高明在《古陶文汇编》中定为西周时物,古文字学界殆无异议。西周时官府中已使用玺印,并且文献中早有明确记载,《周礼·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又《地官·掌节》:“货贿用玺节。”说明此时在经济商贸活动中,已把玺节(玺印和节)作为货物通行及收受赋税的凭证。《周礼·秋官·职金》:“辨其物之媺(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即可证明当时在接收、查验赋税或物品时须用盖有玺印的标签木牌加以封存。近年在一些先秦墓葬中发现有圆腹罐或竹筩(箱子),上挂有注明内装物品及数量的木签牌 29 件,并有使用玺印钤记的封泥,这也足以证明玺印的这种封缄功能^⑥。《周礼》虽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与西周时期相去未远,这样重要的文献典籍应有所本^⑦,决无穿凿的可能。

张振林先生在《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一文中,对一部分金文的时代特征作了系统的界定,这当然也可以作为玺印文字的断代标准。他对“车”字的形态作了排比。西周后期,“车”字稳定为繁简二体。春秋以后,繁体“車”字已经淘汰,单字和偏旁都使用简体,算是完全成熟。根据这一判断,我们把从侧面描绘车形并带有篷盖的“車”字单字玺印定为西周时期玺;而把“高陵車”玺印定为春秋时期,其根据是:印文中“車”是車之省简,故该玺应



图 二

早于战国,而晚于西周。该玺“高陵”两字的用笔和结体都有《侯马盟书》的蝌蚪文形态,这也体现了它的时代特征。所以,玺印文字与同时代金文和书写文字的形体特征的相通之处正是我们判断玺印时代的标准之一。

笔者曾撰有论文《春秋官玺考说》,对车战、右、君子、王孙、士、上士,进行了考证,认为车战鼎盛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军队的主体是车兵(甲士),春秋的战争是车战。因为车右、王孙、君子、上士等都是春秋时期具有特殊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的职官(爵位)或称谓,所以,凡印文为“右”、“君子”、“王孙”、“王孙之右”、“君子之右”、“上士之右”、“王之上士”、“上士”、“士君子”的印章皆为春秋时的官玺。对这些玺印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奴隶社会的崩溃、封建社会的建立作为考察内容,以车战盛衰为依据,综合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背景资料进行了考辨,从而使这一批古玺得以断代在春秋时期。我们认为这是一条确认春秋玺印断代的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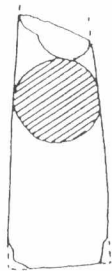
春秋时期,玺印已广泛应用于公文传送中。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言:“季武子(鲁卿)取卞,使公冶(大夫)问,玺书追而与之。”^④根据这条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1. 春秋时期封检文书已使用玺印。
2. 此事并非孤立的事件,亦非一国之制。应视为此时已在各同普遍使用玺印封检文书。
3. 卿有玺印,大夫、上士、士以及政府的其它官吏也应当有官玺佩带或使用。应该说,一整套的玺印制度已初步形成,只是甚少见于先秦文献。
4. 现在传世的先秦古玺中并非如旧说那样全为战国玺,其中有不少是春秋或西周玺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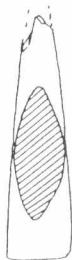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社会性质、时代变迁、典章制度、文字字形的时代特征、钮式等标准来判断玺印的时代。大量出土的春秋时代的金石文字为鉴别春秋玺印提供了字形上的根据,为分辨玺印的时代提供了可靠的参照标准。目前这一工作已为某些古文字学家、印学家



图三



图四



图五

所重视,今后必将继续深入下去。诚如此,要把玺印在这一时期的断代都分得很清楚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这或许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我们把已可确认的西周玺印和春秋玺印单列外,仍将可能含有西周、春秋时代玺印的大部分先秦玺印统称为“战国玺印”,以待继续研究和鉴别。

二、战国古玺的地域特征

战国文字资料西汉前期即有发现,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均代有所获,建国以来,发现更为丰富。根据这些庞杂的文字资料,清末王国维提出“东西二土文字”说^⑨。“东土文字”指东方的齐、楚、燕、三晋以及周边的小国文字;“西土文字”专指秦国文字。1934年,胡小石《齐楚古金表》对古今文字派别提出了殷、周、齐、楚四派的观点。他认为:“齐、楚两派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其结体多取纵势。所异者,齐书宽博,笔画平直而流为精严;楚书流丽,笔画冤曲而流为奇诡。……北方诸国如纪、如邾、如曾、如铸、如晋、如燕,皆属齐者也。南方诸国,如宋、如荪、如鄆、如郢、如郢、如吴、如芟,皆属楚者也。鲁地近齐,其末世之书,亦入齐派。”^⑩虽然对齐楚文字的特点评价准确,但把东周文字分为南楚北齐两派免过于粗疏了一些,但是却比王氏的东西二土的分法更进了一步。

五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在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战国文字地域性特点之后,提出五系文字的理论,按照文字的风格和结体,把这一时期的文字分为三晋(周、卫附)、秦、燕、齐、楚五系^⑪。接着又在《战国文字题铭概述》一文中用传世和出土的金、石、货、玺、陶、简、帛等战国文字资料,根据字的形体特征及地名、出土地等确定其地域,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等五域,指出其若干地域特点,把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予以阐述,是第一篇系统全面研究战国文字的综述文章。他以地区分类,即以“系”分类,一系之内既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文字,如燕系文字、秦系文字,也可以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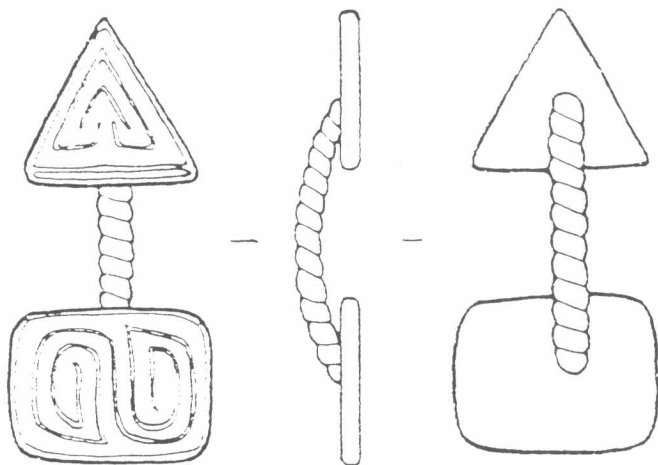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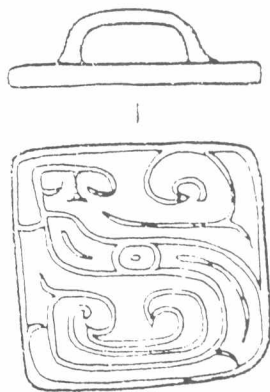


图 六



图七

若干周边国家的文字,如齐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等。这种以地域为经、断代为纬的分类法为当今古文字学家们普遍肯定和采用^⑫。

八十年代末,何琳仪先生的《战国文字通论》对战国时期包括玺印在内的各种材质的文字资料,进行清理分域,“博采众说,去取矜慎,推陈出新,多有创见。”^⑬他区分各系玺印文字的风格、形制特征、地名、职官名的异同来判断其地域所属,并对玺印文字的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特殊符号(重文符号、合文符号、省形符号、对称符号、区别符号、装饰符号)等方式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归纳总结,为我们运用这些规律释读古玺文字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汤余惠先生《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战国文字形体中的笔划、偏旁的省略,战国文字形体的分合、字形的讹误、辅助性笔划、地域性特点,战国文字异形的成因,及与商周古文的辩证关系等问题作了阐述和论证,尤其是根据古玺印风格和文字的结体特点附录了《古玺汇编》中的燕系、楚系、齐系玺印(官、私、吉语)分类表,列编了玺印一千余方,虽不可能全部妥贴,但为古玺印的分域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

曹锦炎《古玺通论》分上下两编,上编古玺与古玺文字(古玺的时代、古玺的认识和研究、古玺的形制、分类与使用、古玺文字的构形特色、古玺文字的地域特色);下编按楚、齐、燕、三晋、秦五系对官玺分国考证。多汇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心得,“对古玺作了多角度的综合考察,于概述已有研究成果之外,更广开新的境界。”(李学勤《序》)。

七十年代至今,除上述专著外,尚有不少专家学者从事此项研究,他们或考释文字,或鉴定国别,各有创获。尤其是台湾女学者林素清早在1976年就有《先秦古玺文字研究》等一些玺印著述问世,这些论著使原本甚为混沌迷离的古玺印逐渐有了比较明晰的轮廓和分野。本卷对古玺的时代和地域分类便是在古文字学家们的研究基础上,参以自己的研究心得而形成的。

在先秦古玺中,楚官玺多为白文,部分有界格。字形线条圆转流畅,与楚金文及简帛书书风相近,刀法酣畅,结体散逸,秀而不媚,颇有毛笔书写的意味。



图八



图九



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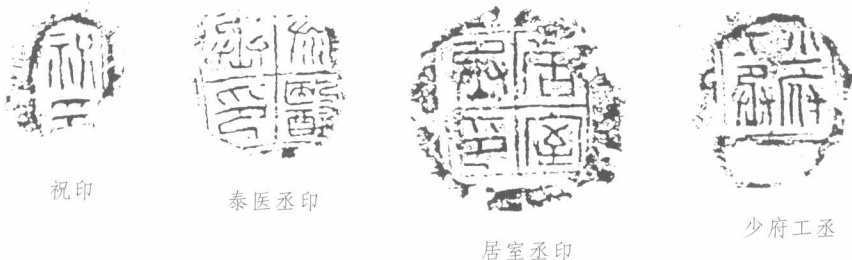
齐官玺字形笔划匀称,体势修长,但不如燕,三晋文字整饬,布局随意性较大,一些大型官玺更显露粗犷的风格。很多文字具有地方特色,有些文字有一些特殊的装饰笔划。

燕官玺有正方及长条等形制。阳文布白大虚大实,疏密对比强烈,揖让有度,字形在苍劲中不乏灵动之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阴文官玺多为凿刻,线条匀称,结体规整,但布白疏密不均,有自然错落之意态。

三晋官玺多为阳文,且形制大多偏小,大小几与私玺相仿佛。文字结构端庄整饬,笔画细劲,布局精巧,或铸或刻,工丽精美。

《秦公大墓石磬文字》经王辉先生研究,定为春秋中晚期之交的秦景公时代^⑭,与字体相近的著名的《石鼓文》应是同一时期作品,或稍晚一些。二者有近半数字已是小篆形体,故知秦玺用字在大小篆之间者,应是春秋时物,而全为小篆之秦玺则当是战国至秦代时物,然战国晚期秦官印已有田字界格,这一点在战国秦封泥中可以得到验证。近年在西安北郊章台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秦封泥,有二百多个品种,包括中央之官印 150 多种,郡县之官印有地名五、六十种。规格在 $1.6 \times 1.6\text{cm}$ —— $2.2 \times 2.2\text{cm}$ (比汉封泥小 0.2cm),半通印(秦印方寸之半)规格在 $1.9 \times 0.6\text{cm}$,为判别秦官印建立了一个准确的断代条件^⑮(见图十一)。综合而言,战国晚期至秦代,官印一般为凿刻白文,字形略长,线条圆转流畅,字体为摹印篆(近于小篆),整齐而灵动,与秦权、诏版文字风格相近,印文间大多有田字格,或日字格。至秦官玺不称“钁”,而只称“印”。

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现象普遍存在,各地域玺印文字颇多特殊形态和写法,可以作为鉴别玺印地域的标志,现略举数例列表于后,以便比较。从这个表格中的文字可知,因时代、地域的不同,文字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文字异形现象普遍存在。其体势的差异,如纵长、圆扁、方棱、盘曲、纤丽、粗壮等风格,通过比较则易见其奥妙。至于各专类书刊所讲的简化、繁化、减笔、增笔、借笔、挪让、穿插、讹变,以及特殊符号的合文、重文、省略、装饰等符号,都因国、因地、因字、因印而异,是文字构形上的一些变化,反映出比较复杂的文字现象,这现象的



图十一

发生,或有地域性的因素,或有章法布局的需要,或是工匠的“创造”……,因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详细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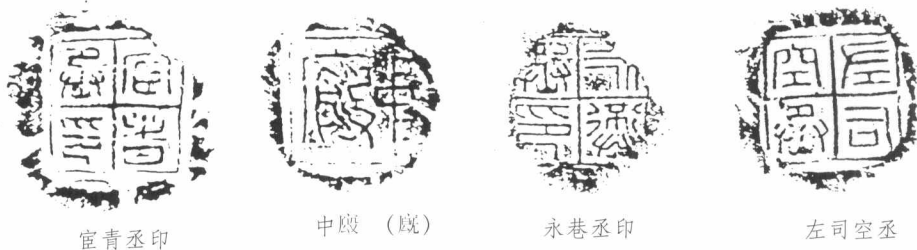
先秦古玺文字异形、诡谲奇异,变化多端,不仅使古文字学家、印学家难于释读,也往往使读者望而生畏;但又正是这些奇异的文字,在方寸之间,错落疏密、朱白变幻,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灵。

三、先秦古玺的艺术风格

黄宾虹先生曾在《古印概论》一文中对古玺的艺术特点作了概括:“古玺印文字奇特,结构精妙”。“一印虽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钧重器同其精妙。”^⑩我们认为先秦古玺的艺术风格应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其一,即字形繁复,文字奇特;其二,形制多样,钮式奇异;其三,章法布白活泼生动。文字特点前文已作略述,这里就印章形式与章法布白的特点作一介绍。

先秦古玺的印面形式似无定制,因资料及文献所限,尚难条分缕析。东周玺印的大小悬殊很大,所谓“大者数寸,小者累黍”。如烙马、烙木、仓廩、王室等一些专用玺印形制较大,陶质玺印一般较大。如燕国烙马玺“𠙴(唐)都萃车马”(6.6×6.9cm,见本卷 57 页),齐国“陈搏三立(蒞)事岁右廩釜(釜)”(8×4.8cm,见本卷 41 页),再如齐系须句小国涖盟旌节“须戴丘涖盟旌”(5.3×5.9cm,见本卷 24 页)、“易都邑聚徙盟之𠙴”(4.5×5.3cm),晋系陶玺“郈氏”(8.4×8.1cm,见图十二),秦王室用印“王兵戎器”(棱形 3.8×4.6cm,见本卷 25 页)。而以上各玺系官玺小的仅有 1.0—1.4cm 左右。三晋官玺除市玺、水玺等例外,大多不超过 2cm。

楚官玺的印面大小尚无定制,大的如“大廩”(5.3×5.9cm,见本卷 26 页),小的如“𡗗𡗗郢官”(见本卷 31 页)只有 1cm 见方,很可能与官署的大小及职官的显微有关。但本卷图版 32 页收录的几方“某某客𠙴”,大小为 2.9cm 见方或 2.2cm 见方。图版 33 页收录的四方“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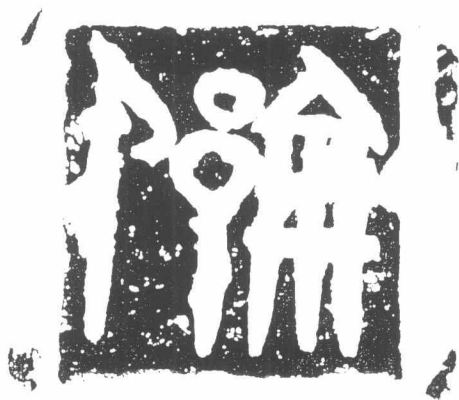
图十一

官之钁”，印面为 2.4cm 见方或 1.7cm 见方；图版 34 页收录的“某里之钁”，印面为 2cm 见方，似乎在形制上尚未有非常严格的统一规定，但“里钁”，要小于“客钁”、“计官之钁”却是事实。古玺印文凸者为阳文，凹者为阴文。东周各国玺印的印面各有自己的特色。楚系玺印以正方形为多，圆形较少；除极少数为阳文之外，大多作阴文；印多有边栏，其中少数有竖界无横界，如“造廌之钁”等（见本卷 27 页）；有横竖界格作“十”字格者，如“正（征）官之钁”、“弋阳邦粟钁”、“客戒之钁”（见本卷 31、32 页）等；圆形有边栏者，如“孰关”、“里闲愧大夫钁”、“权君之钁”等（见本卷 27、34、40 页）。楚系玺印的钮式以坛钮为多。

楚玺中有一种形制特殊者，是用两块或三块玺印契合而成。如 1956 年长沙沙湖桥出土的一方“大钁”铜玺（见本卷 38 页），现存两合玺的右半方，其钮为半圆柱形，上面有凸起的铆樨两个，凸起的铆樨便于和另一半的凹樨契合^{①7}。在长沙还发现过一枚由三块扇面状铜印组合而成（圆柱钮）的三合玺“郑菱钁”（见本卷 39 页）^{①8}。此类契合玺印在其它地区尚未发现，目前看来应为楚地所特有。

齐官玺以阴文为多，或不施边栏，或有边栏，少数有竖线界格或十字界格。如“右水都徙盟金钁”、“平阳右司马钁”、“裨将匠𠂔信玺”（见本卷 43、46、48 页）等，只有边栏而不施界格。文字多的在边栏中加两条竖线界格者，如“东武城工师钁”（见本卷 49 页），在齐官钁中极为少见。齐官玺还有在正方或长方形印面的上端作中央凸出者，如“易（阳）都邑聚徙盟之钁”、“徙盟之钁”为凸形；或在上下两端中央凸出者，如“齐立邦玺”作凸形；或在下端中央凸出者，如“□易钁”，作凸形；还有曲尺形玺，如“左正钁”作凸形；“尚徇钁”作凸形；磬形钁，如“车□信钁”作凸形。这些都是齐官玺中颇具特色的品种（见本卷 42、51、52 页）。齐官钁其他特异者，如“下匡水取（渠）”计有两印，一阴一阳，大者为 2.7×2.7cm，小者为 1.7×1.7cm，但文字风格相同，是管理水渠的官吏用印（见本卷 56 页）。为何有两钮尺寸不同的官玺出现？尚待进一步研究。

燕官玺多为阴文有边栏无界格者，布字多为两行，字数不等，大小不拘，工拙不计，自然



“郇氏”陶玺

图十二



甲



乙

图十三

错落,生动活泼(见本卷 61—66 页)。或两行印文密集中部而两侧布红,如“洵城都右司马”、“洵城都遽驺”、“柜易都左司马”等;或布白平满,疏密得宜,如“妘(容)城都枋郟左”、“竣都遽驺”、“桤(范) 湏都左司马”等;或偏于一隅空出一侧或两侧布红,如“洵城都丞”、“竣都右司马”等;或印文字数不等、错落有致留出大块红地,如“庚都丞”、“雷耶(旦)都丞”、“沃(黍)□都丞”等。这些印大多为 1.8—2.3cm 见方,虽格式相同,但布白却各显风采。另外,阳文烙马铤“曠(唐)都萃车马”、工官铤“郟(涿)铸师铤”呈“U”形布白构图(见本卷 57 页),使中上部空出一块白地,有舒畅豁达之致。这种“U”形构图的布白方式,在东周古玺中是一种特异的风格。这种风格在楚、齐系古玺中也时有应用,如楚系阴文官铤“豕母司关”(倒 U 形)、“武关戡”“计官之铤”(见图版 27、28、33 页),齐系阴文官玺“左廩之铤”、“盖丘吏人铤”、“夷里贷铤”等(见本卷 43、53、55 页)。在这类风格中,燕烙马铤形制较大,又是阳文,因而更具代表性。燕系官铤中有一些长条形官铤,如“单佑都市三伏(符)镡(瑞)”、“中军壹(鼓)车”、“大司徒长伏(符)乘(证)”、“中易(阳)都□王伏(符)”、“右宫”等(见图版 58、59、60 页),是燕国玺独有的形制。

燕国私玺中的鸡心形玺如“王孙之□”、鸡心形成语玺“得志”、“悲”,以及尖腰形玺如“畋生右马”、“良生咎”、“大吉”等,也是燕地特有的形式(见本卷图版 219、192、220 页)。

三晋官玺以封君印略大,如“酈襄君”、“春安君”、“君之信铤”、“凶奴相邦”,边长均在 2.3—2.5cm 之间,且皆为阴文。“司寇之铤”(2.6×3.2cm)、“高陵车”阴文长方铤(2.8×3.1cm)与“宋吏”(2.2×2.2cm)等印的文字风格与春秋晚期侯马、温县盟书相似。三晋官玺大都为正方形阳文,且多有宽边或窄边,印在 2cm 以下,边上大多在 1.4—1.6cm 之间,印文字划较细,文字秀丽端庄。钮为坛钮。“阳城冢”为馒首形陶玺,可能用于陶器压记之用,故较大(2.7×2.9cm)。“筭(汝)阳埤(市)”(3.4×3.4cm)及“安阳水铤”(3.4×3.7cm)一阳一阴,形制皆大,亦可能为用途不同所致(见本卷图版 71—90 页)。

东汉蔡邕《独断》曰:“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又引卫宏语曰:“秦以前民